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编号: 18CYY018)

中国的三语教育

——模式与挑战

【英】冯安伟 【英】鲍勃·亚当森 主编

张露茜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编号: 18CYY018)

H09
244

中国的三语教育

——模式与挑战

【英】冯安伟 【英】鲍勃·亚当森 主编

张露茜 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字:11-2018-42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三语教育:模式与挑战 / (英)冯安伟,
(英)鲍勃·亚当森主编;张露茜译.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 8

书名原文: Tr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in China:
Models and Challenges

ISBN 978-7-5178-2943-0

I. ①中… II. ①冯… ②鲍… ③张…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语—教学研究—中国②汉语—少数民族教育—教学研究—中国③英语—少数民族教育—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H2②H19③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6337 号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r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in China: Models and Challenges* by Anwei Feng and Bob Adamson, 1st edition

Copyright ©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Dordrecht 2015*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 V.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的三语教育——模式与挑战

[英]冯安伟 [英]鲍勃·亚当森主编 张露茜译

责任编辑 王英

封面设计 叶泽雯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82千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2943-0

定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此书谨献予中国正致力于推进三语教育的
教师们。

译者序

《中国的三语教育——模式与挑战》一书第一次为读者全面介绍了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及其对 1 亿少数民族人民语言的教育影响。书中讨论了中国本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学校的语言政策和实践情况。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加强和边界各国的交流需进一步推广英语、汉语以及小语种,本书的推出正符合了当下时代的需求。该书基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理论,重点研究少数民族的三语教育模式,即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家庭用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普通话及作为主要外语的英语这三种语言的教育模式。

本书由序言和 11 篇论文组成。除编者撰写的首章与末章外,还包括三个部分,共 11 章。本书致力于以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存活力研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对学生的汉语、英语的习得与总体学习成绩相关的问题和影响研究。此外,还考察了广东粤语。粤语作为汉语方言非常强大,但其与中国主流语言即普通话明显不同。

书中采用一种新方法研究社会语言现象。编者提出基于欧洲社会双/三语研究的一种新方法论,并将其针对性地运用到中国的三语语境研究中。新方法论包括政策分析、社区语言档案调查,以及学校的实地考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以推动三语语境下政策的多层次分析。翻译初始,鲍勃教授就嘱咐要特别留意政治意识形态差异问题。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也秉承这个原则,反复斟酌合乎中国语境的恰当用词。此外,为行文顺畅,文内 Medium of Instruction(MoI)的翻译共用“教学媒介语”“教学用语”“教学语言”。

该书的价值体现在其符合当下中国的多语言发展趋势与需求。该书的特点是运用新研究方法对中国三语教育的政策与实践进行模式组合,并提出当前面临的挑战。编者们在 2014 年 11 月底举办的多语言与中国的多语言教育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上对该书进行了推广与介绍,受到与会国内外多语言教育专家学者的热烈

欢迎。随着英语成为中国语言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添加性语言,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研究已从过去的双语教育提升到三语教育层面。

现将该书翻译成中文,目的是在国内扩大读者范围与该书的影响力。通过中文译本帮助更多的三语学者与其他使用者更轻松地理解书中描绘的中国的三语现象与三语教育情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促进中国少数民族的三语教育发展,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世界其他地区的中文读者也能借鉴该译著,了解中国当前的三语教育发展。译者在翻译时为方便读者查阅文内信息,特意保留英文文献出处。

值此翻译结束之时,再次感谢编者冯安伟教授与鲍勃教授对译著的支持。另外要特别感谢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七位研究生——毕怡、范露忆、汪皓月、南懿珊、孙苗苗、黄银、褚张妙协助翻译了本书的后半部分。译著虽经多次修改,但难免有翻译遗漏与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来信指正。

张露茜(博士)

邮箱:zhangluxi@zjgsu.edu.cn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年9月

序 十字路口的三语教育

三语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第一个三语铭文来自公元前6世纪的“贝希斯敦铭文”。这个铭文由大流士一世^①所作,雕刻在悬崖的记功石刻上,位于近伊朗的西部古城克尔曼沙阿市。铭文有三种语言:旧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德语(古巴比伦语)。第二个来自“莱图恩三语碑碣”,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其文本包括亚拉姆语^②、希腊语和利西亚语^③。碑碣铭文在莱图恩寺庙被发现,并在土耳其的费特希耶博物馆展出。更有名的一个铭文来自大英博物馆展示的“罗塞塔石碑”,可追溯到公元前196年。该铭文于埃及的拉希德镇被发现,是一篇赞美法老托勒密五世的文章。铭文由两种语言(埃及语和希腊语)书写而成,但是使用了三种书写体——象形文字、通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另一个三语铭文来自9世纪喀拉巴拉哈逊^④(今蒙古)的铭文,包括古突厥语(古维吾尔语)、粟特语^⑤,汉语。

三语也曾在中世纪出现过。1066年诺曼征服(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军事征服)之后的许多年里,拉丁语、英语、法语被英国人使用,且发挥了各自不同的功能。另一个在中世纪出现三语记载的例子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圣修道院的注释”。这是一部拉丁法典,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⑥旁注。

2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三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世界性关注。英语作为一种国

① 大流士一世是波斯帝国君主。

② 亚拉姆语是闪米特语族(闪族)的一种语言,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相近,距今有3000年的历史。旧约圣经后期书写时所用的语言,被认为是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的日常用语。

③ 利西亚现位于土耳其南部海岸的Tekke半岛,其文明受到古希腊的影响,最后被罗马帝国侵略。

④ 喀拉巴拉哈逊是古代北回鹘汗国的都城。

⑤ 粟特语是粟特人使用的语言。粟特语一度成为中亚、北亚的一种通用语言。属于伊朗语族中一种古代东部语支。伊朗语族约20种语言,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分布在伊朗(波斯)、巴基斯坦、伊拉克、土耳其、高加索、中国新疆等地。粟特语在公元前6世纪已出现,现发掘的粟特语文献大多数是敦煌发现的佛教文献。

⑥ 巴斯克语是全欧洲唯一使用的非印欧语系的语言,现仍是居住在西班牙及法国交界的巴斯克人所用的语言。巴斯克人可谓欧洲最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追溯到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际交流语言,经常被视为第三种语言,不仅被增加到世界各地不同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中,也被增加到许多双语地区学校的课程中。尽管三语拥有悠久的历史,且与当今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但三语习得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事实上,只在近 20 年,我们才见到超越双语教学的出版物、会议和期刊的激增。

本卷汇集了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使用三语进行教育的情况。三语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国家语言的普通话、英语。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也在教育中使用三种语言。尽管学校使用的语言类型和学校的语言目标存在差异,但现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英语是学校课程中的必学语言之一。

三语教育研究具有多学科性,因为它汇集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多种教育维度。作为在校学生多语言能力发展不可分割的三种语言,可能在语言距离上不同,在书写文字上也不一定相同。语言学习的过程不仅涉及心理语言学因素如语言倾向和策略,也涉及学校所在地社会语境下的语言活力问题。从这一卷书中能看到,教育允许学校在采用语言模式及其中运用的人力和材料资源方面存在多样性。

学校的三语习得研究不仅能促进学科融合,也能融合二语习得(SLA)和双语(Bilingualism)教育。二语习得传统上通过关注二语习得的不同阶段与影响过程的因素,重点研究二语习得的过程。双语教育则更多研究双语的产出结果,关注语言被双语个人和/或双语社区使用的方式。在三语教育语境中,学习和使用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学生在学校里能接触到三种语言,当学习这些语言的时候,他们能够通过具备的多种语言资源学好这些语言。鉴于此,三语教育研究不是单向的,表现在它不只是研究语言教学过程或产出结果,或只是在一段时间内的一种语言或两种语言。三语教育研究关注整体研究,比其他仅专注于语言习得或语言使用的观点提供更多有洞察力的见解。

我们在这一卷书中看到少数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和英语的结合提供了一个真实丰富的语境,因为它将教育与体现在人口学、身份地位、机构控制上的不同语言的活力相联系。该卷还证明了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是如何基于它们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身份地位,分享一些基本的特点的。同时,这卷研究表明,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根据其人口信息、官方语言地位和语言威望的强弱,占据不同的语言地位。三语在中国和其他环境中的教育,与在教育中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具体特点、面临的挑战相关,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是否具有官方语言地位和认可度,是否拥有合格的

教师和教材,是否是标准化语言,还有最后一点,即人们对在教育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态度如何。本卷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除被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分享的研究外(Cenoz and Gorter 2008; Cenoz 2009)。中国以外的学者经常将中国作为一个语言同质的国家。这本书中体现的关键点之一,即为国外学者阐明中国具有巨大的语言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中国不同地区的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特点、人口学、社会经济地位相关。

通过中国三语教育的例子能清楚地显示,英语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被视为一种世界语言和世界通用语。中国教育中,英语已经成为学习课程之一(参见 Adamson and Feng, 2014; Feng, 2007, 2011; Ruan and Leung, 2012)。本书清楚地表示,即使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英语,英语的语言威望非常高。英语被认为与社会流动相关,而就接触英语的途径来说,城乡区别巨大。此外,本书通过各省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以证实普通话作为国家语言的力量。一些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国家如玻利维亚、秘鲁,也有与这种情况类似的一些三语教育特征。这些国家有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克丘亚语^①和艾玛拉语^②的人,他们还广泛使用作为国家语言的西班牙语,并将英语作为第三种语言。中国的三语教育情况具有西班牙少数民族语言(如巴斯克语、加泰罗尼亚语^③、加利西亚语^④)的特征。除少数民族语言外,西班牙语是国家语言,英语作为第三种语言。另如在法国境内,除少数民族语(如巴斯克语、科西嘉语^⑤、布列塔尼语^⑥)外,法语是国家语言,英语作为第三种语言。

本书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意义重大。其重大意义在于:通过汇集中国三语教育的不同模式,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这反过来又可作为三语教育地区学者、政策

① 克丘亚语是一种美洲土著语系,是美洲土生土长的原住民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使用者大概有 600—800 万,主要分布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南美国家。

② 艾玛拉语是住在安地斯山脉的艾马拉人所讲的语言,玻利维亚的官方语言之一。艾马拉语和克丘亚语有许多相同的词汇。艾马拉语的语法是基于三值逻辑,而非一般语言所使用的双值逻辑;被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弹性大,能容纳许多新词汇,Guzmán de Rojas 指出其可用作机器翻译的中介语言。

③ 加泰罗尼亚语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是西班牙拥有最多使用者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拥有官方语言的地位。尽管其大部分口语使用者在西班牙,但是位于西班牙和法国间的安道尔公国,是世界上唯一正式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国家。

④ 加利西亚语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是西班牙官方语言之一。使用者约 300—400 万,分布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自治共同体和葡萄牙。

⑤ 科西嘉语是罗曼语系的一个分支,为法国本土东南部科西嘉岛居民使用。科西嘉语与意大利语相近,特别是意大利语中的托斯卡纳方言。科西嘉语是传播科西嘉文化的主要媒介,其特点是包含大量谚语。

⑥ 布列塔尼语是法国西部布列塔尼的少数民族语言,欧洲大陆上唯一残存的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言。

制定者、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参考,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学习其他语境。中国的其他地区也可以利用该书,提高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地区多样性语言形势和政策发展的认识。《中国的三语教育——模式与挑战》一书为中国以外的学者、决策者、教育工作者提供的相关信息,定会受到对多语言教育感兴趣的全球读者的欢迎。除提供有用信息外,本书对三语教育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它超越了单纯语言情况的描述,成为不同类型政策模式概念和理论的探讨。它相应地探索了在中国可以找到的三语教育地区学校对少数民族语言支持的差异性与语言活力问题。冯安伟与鲍勃·亚当森已经准确成功地为该卷确定了四个主题,用以比较中国不同地区的三语教育:语言距离、社会语言学背景、利益相关者态度、教育语言的使用。同时,在进行研究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方法,运用三角测量法得到更多可靠的研究结果。

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其汇集了大量三语教育发展模式和语言背景,并且展示了与语言现状及其在学校课程中的应用相关的三语教育的动态情况。最重要的是,本书凸显了更多的了解语言间动态互动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三语教育研究议程中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在于,随着多语言学生获得更广泛的语言技能,其所拥有的语言资源也能相应得到提升。

巴斯克大学(UPV/EHU)

哈索尼·赛诺斯(Jasone Cenoz)

(西班牙巴斯克大学语言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Adamson, B., & Feng, A. W. (2014). Models for tr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D. Gorter; V. Zenotz, & J. Cenoz (Eds.), *Minority languages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p. 29—44). Berlin: Springer.
- [2] Cenoz, J. (2009). *Towards multilingual educ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3] Cenoz, J., & Gorter, D. (Eds.) (2008). *Multilingualism and minority language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 education*. Special issue of *AILA Review*, 21.

- [4] Feng, A. W. (Ed.) (2007).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Practices, policies, concept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Feng, A. W. (Ed.) (2011).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cross Greater China*.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5] Ruan, J., & Leung, C. B. (Eds.) (2012).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literacy in China* (p. 1—17). Dordrecht: Springer.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的三语与三语教育研究·····	冯安伟	鲍勃·亚当森	(1)
-----	-------------------	-----	--------	-------

第一部分

第二章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学校的四种三语教育模式 ·····	董 芳	那日苏	郭琰晖	王兴刚	邱 嘉	(26)
第三章	中国朝鲜族的三语教育·····	张贞爱	温丽婷	李广合	(47)		
第四章	语言学习与赋权:新疆维吾尔族的语言教育 ·····	苏 诺	曹 月	(64)			

第二部分

第五章	青海藏族学校的民族语言活力和语言态度与教育 ·····	马 福	仁 增	(100)			
第六章	当藏族学校的英语课程遇到汉语课程 ——对西藏多语教育的理解·····	肖志敏	史蒂夫·希金斯	(112)			
第七章	凉山彝族自治州三语和三语教育的多重案例调查 ·····	刘承宇	丁泓棣	汪 虹	余丽娟	杨明忠	(134)

第三部分

第八章	云南三语和三语教育调查报告 ·····	原一川	胡德映	李 鹏	朱宏华	王进军	尚 云	巴红斌	(164)
-----	------------------------	-----	-----	-----	-----	-----	-----	-----	-------

第九章 贵州侗族新兴的三语教育	雅各布·E·菲尼弗洛克	石天赐(189)
第十章 广东中学的语言态度研究		朱其韵(212)
第十一章 三语教育——模式与挑战	鲍勃·亚当森	冯安伟(228)

第一章 中国的三语与三语教育研究

冯安伟^① 鲍勃·亚当森^②

摘要:绪论论述了本卷书各章使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各章研究报告基于中国一项全国性的三语与三语教育研究。过去,这个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单独研究一个或者几个不同少数民族自治区(或州)的三语与三语教育。但是尚未有已知的相关调查,为当前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规划现状提供全面、可比较、批判性的解释。本章首先提供了由主要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小组共同努力完成的全国性项目所采用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并介绍广东省提供的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研究。之后,详细地展示了研究设计,从全国性研究网络的建立、研究问题的制定、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使用、研究工具的设计,到本书的结构框架的制定。为确保研究结果具有可比度、有效度、可信度,相应策略的使用显然很重要。最后,本章列出本书的读者范围,包括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制定者、教师和研究员。

关键词: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三语兼通(三种语言的掌握);三语教育;政策制定;民族语言活力;添加性三语;赋权;多案例研究;混合方法论;目标读者

^① 冯安伟(A. Feng)(通讯作者),就职于宁波诺丁汉大学教育学院,邮箱: Anwei. Feng@nottingham.edu.cn。

^② 鲍勃·亚当森(B. Adamson),就职于香港教育大学国际教育与终身学习系,邮箱: badamson@ied.edu.hk。

1. 绪 论

三语与三语教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多种形式存在。本书调查 21 世纪三语与三语教育的发展。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校已教授外语(英语最常见,但同时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也教授俄语、日语及阿尔巴尼亚语等),并且学生们也一直在学当地的方言与标准版汉语。当地的母语包括数以千计的多样化中国地方方言,如粤语、上海话、福建话、潮州话等,以及主要居住在国家边界的少数民族语。因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当地方言、国家语言、国际语言的角色和地位在教育政策中的体现,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多样化的中国语言,在强大的国家统一标准的宣传面前,往往容易被忽视,使少数民族语言的命运(与英语一样)随国家建设的不同阶段而浮沉。但在近年,各种不同的教育政策支持三语的发展。这些不同教育政策的交汇,创造了重点关注三语教育实施的环境。一直以来,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加强普通话的重要作用、鼓励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这三条教育政策分别独立出现。可见,三语教育缺乏内在、基本、连贯的相关理论。但政策的实施已经越来越要求教育当局平衡三语培养的方法。这些发展构成了本书关注的中心,且我们认识到三语不只是少数民族群体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55 个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群体。这些群体有大量实质性的关于不同语言使用和教育的文献发展,其出现时间比当前 21 世纪早期开始的三语教育运动还要早得多。大部分的文献追溯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历史,考察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混合社区的双语现象、展开了围绕双语教学问题的争论,如戴庆厦等人(Dai et al., 2000)的工作。进入本世纪以来,相关文献发展更加迅速。

如此迅速的发展无疑归因于一个事实:中国的英语教育已得到正式的推广,且推广力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劲,包括在少数民族占主导地位(Feng, 2011)。英语的传播对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规划最终将成为一个更为复杂和多元化的任务。当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的双语和双语教育讨论还在延续的时候,过去的 10 年见证了学术上三语兼通研究的迅速发展。三语兼通即掌握三种语言,包括少数民族当地家庭使用的母语(L1)、作为二语(L2)的普通话、作为三语(L3)的英语,或者简称三语(trilingualism)和三语教

育(trilingual education)^①(Adamson and Feng, 2009; Feng and Adamson, 2011)。虽然这看似新的现象已被研究并多次讨论,但是相关研究通常仅单独在不同地区进行,而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基于有限的实证证据。本卷书写作的目的即填补这个空白。针对语言在使用中的现状以及对当地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规划,本书提供了一个以证据为基础,全面、可比较的批判性分析。此外,还涉及以粤语为母语的群体的语言影响问题。

2. 语境的复杂性

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群体任何方面的调查研究,都需从整体上认识背景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更具体地说,即集中性和多样性间、边缘性和弹性间的相互关系。仅凭少数民族群体一直受同一政权领导超过60年这一点,少有研究者质疑少数民族群体间存在很多共同点。少数民族群体与汉族人民在立法和法律上一致,并且享受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在省级自治区层面上,例如所有的五个自治区^②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民有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的规定,遵守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政策。尽管少数民族被宪法授予使用和维护他们的语言 and 文化的权利,但是所有文件中都有一条共同条款,即在全国,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广普通话。这些条规的创建存在明显的矛盾(Stites, 1992, 引自 Lin, 1997)。最终,依照国家社会的变化,过去几十年的语言发展见证了在语言和文化的同化推广和双语推广之间如钟摆晃荡般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民族语言活力较强的地区尤其明显。但是在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同化已普遍流行,因为不同水平层面上的政府都

^① 像其他许多中国学者一样,当论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三种语言——少数民族家庭语言、普通话、英语的教育与能力的时候,我们使用术语:三语与三语教育。这是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体如今面临的形势。然而,有必要注意,实际情况要比这里提到的复杂得多。在英语被引入到学校系统之前,一些少数民族早就已经是三语或者多语环境(Dai and Cheng, 2007),而另一些少数民族如回族、满族、畲族、土家族由于历史原因,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少数民族语言,将普通话作为他们的家庭语言。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学校的课程自称所用三语教育模式,但实际上隐藏的语言学习目标还只是单语或有限的双语教育。因此,三语与三语教育术语虽是简单的标签,但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情况。

^② 虽然少数民族群体在全国各地都有,但主要分布在为中国地区的五大少数民族专门设置的五大自治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尽管批评家如Lundberg(2009)和Mackerras(1994)认为从政治角度上来说,由于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区域实行的模式是提供一些真正的自主权。但是每个自治区都正如其名称所提示的那样,被宪法赋予了行使地区自治的权力。

采取有力措施以促进二语,即普通话在学校和社会的使用。

少数民族群体目前有一亿多人,其历史、文化、语言非常多样化。即使在同一少数民族群体内,这些领域都存在很大的实质性差异。从语言学上来说,任何人口相对较多的少数民族,例如藏族,会讲几种互不相通的“方言”(Denwood, 1999)。由于地理、人口、社会文化、历史、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家对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政策上也有差异。我们以全国高校招生考试为例。考试语言为普通话和6种少数民族的语言,包括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朝鲜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Mackerras, 1994)。有必要这样做的原因是这6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者众多,且已建立长期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并都生活在靠近邻国的战略要区。除可见的差异外,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也造就了少数民族群体的多样性。在特定情境中,少数民族个体与群体会坚定地站出来协商其文化身份与语言权利,这时,少数民族群体与国家或地区政府之间存在更为频繁的交互(Schluessel, 2007)。

文献中似乎有一个观点,少数民族群体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沙漠地区或山区。据统计,近三分之一官方确定的贫困县地处西部,主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Yang, 2005)。由于许多学校缺乏基本的资源,缺少现代化的设施和合格的教师,常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比他们的汉族同学差(Hu, 2007; Jiang et al., 2007; Tsung, 2009),并且他们的辍学率也通常较高。除经济水平和地理因素外,一些学者认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教育落后是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接受了不合适的语言教育,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中国曾受到广泛的尊敬。但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以创建一个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为目标,即在课程大纲、教材、教学活动中,以文化和语言同质化和社会主义方向为特征(Hansen 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主要语言政策制定者已采用同化立场。当汉语能力成为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未来生活的决定因素时,为争夺稀缺的学业机会,他们必须奋力与占国家大多数人口、以普通话为母语的汉族学生竞争。因此几十年来,他们不得不依靠已被证明是把双刃剑的“优惠政策”(Feng and Sunuodula, 2009)。如其中一个重要的优惠政策是允许少数民族学生以比高校招生所需的更低的分数进入一所高校。然而,进入大学后,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往往未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功,甚至许多人不能毕业(Lin 1997; Adamson and Xia 2011)。即使他们成功完成学业,他们被称为优惠政策的受益人,而这大大影响了他们在就业市场的前景。

尽管许多少数民族群体在语言上处于上述边缘位置,但研究证明一些少数民